

棒打出壞子？： 青少年暴力行為的連結機制

李文傑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吳齊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檢視父母的教養行為和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關係對男性青少年暴力行為的影響機制。本研究假設青少年所知覺的父子或母子關係，會連結父母教養行為與青少年的暴力行為。然而，從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中，我們發現對於母親而言，青少年所知覺的母子關係，是母親教養行為與青少年暴力行為間的中介變項，而不是調節變項。相對地，父親的教養行為不只會透過青少年所知覺的父子關係而影響青少年的暴力行為，而且還進一步具有直接的影響，這個結果反映出父親與母親的教養行為對兒子的暴力行為，有不同的影響及社會化路徑。根據本研究的發現，青少年子女所知覺的親子關係，在代間的行為互動之間，扮演著關鍵的「傳導」角色，父母的教養行為，須先透過青少年子女對親子關係的詮釋（知覺），之後才會對青少年子女的暴力行為產生影響。為人父母者若希望自己的子女能避免產生偏差或暴力行為，特別要著重培養良好的親子關係，以及讓子女知道父母行為背後的原因。

關鍵詞：教養行為、知覺親子關係、社會化、暴力行為

Bad Parents, Bad Kids? : The Linkages of Adolescence Violent Behaviors

Lei Man Kit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Chyi-In Wu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authors hypothesized that perceptions of mother-child and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s serve as primary mediators between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violent adolescent behavior. Results from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indicate that perceptions of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 mediate rather than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violent behavior. Surprisingly, paternal parenting practices were found to exert both an indirect and direct influence on violent adolescent behavior.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t pathways between paternal and maternal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violent behavior as expressed by son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fathers and mothers should make strong efforts to create supportive environments and to establish goo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male children.

Keywords: parenting practices, perceptions of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socializat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一、前言

台灣青少年的兩大社會問題，可區分為「內化症狀」(internalizing symptom)與「外化症狀」(externalizing symptom)兩大類(吳齊殷、李文傑 2003)，前者指的是二十一世紀的三大疾病之一「憂鬱症狀」，後者則為大眾普遍熟悉的「偏差行為」或「犯罪行為」，其中青少年「犯罪及偏差行為」一直是政府以及教育單位棘手的社會問題。各種青少年犯罪類型中，除了最普遍的偷竊行為外，其次最值得關注的就是暴力行為，根據 2001 年法務部的統計資料顯示，少年刑事案件中觸犯傷害罪的占 9.45%，在同一份資料裡，更指出少年兒童刑事案件的犯罪原因，以「家庭因素」為首位，占全體觸法少年的 35.31% (法務部 2002)。如果我們只將焦點放在青少年「暴力行為」的層面上，過去已有的研究文獻(例如：Linda 1998; Ireland et al. 2002)同樣也指出，在這變動不定的青少年時期裡，暴力行為受到周遭家庭環境因素影響最大，特別是家庭中父母對子女的教養行為，更是家庭中影響子女身心發展的推手(Garnier and Stein 2002)。

從生命發展的過程著眼，每一個時間點(timing)均載負著過去生命歷程中種種的環境及個人經驗(Elder et al. 2002)，子女的家庭生活經驗，會在適當的時間點，對子女日後的行為產生一定的作用，我們如果只從一段時間去觀察父母的嚴厲管教對子女偏差行為、暴力行為與用藥行為的影響，可以發現父母嚴厲管教若只發生在兒童期並不會構成青少年日後的偏差與用藥行為。整個關鍵點是在於「只有存在於青少年階段的家庭經驗」或從兒童持續到青少年期的家庭暴力，才是問題的重點(Ireland et al. 2002)，因此青少年期的家庭因素，尤其是父母的管教行為，乃是青少年行為問題的重要原因。

實際上，過去已有不少的理論，從不同的觀點說明青少年暴力或偏差行為如何受家庭的影響，其中尤以社會心理學家 Albert Bandura (1973)的「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及犯罪學家 Travis

Hirschi (1969)的「社會鍵理論」(social bond theory)，最爲人所熟悉。前者主要是從青少年學習及模仿的角度，去解釋父母親對子女的影響，後者則以相反的角度，依從「性惡說」認爲每一個人都有犯罪及偏差的本能，問題是每一個人都會因著社會價值與規範，發展出一套與社會連繫的鍵，當個人的社會連結增強，偏差行爲形成的機會便相對減少。無論是「社會學習理論」或「社會鍵理論」都隱含著社會化的過程，只是前者較直接指出了暴力行爲是在個人社會化過程中逐漸從父母學習及培養而來，後者則以父母對子女的社會價值觀及信念等的影響，決定了個人社會鍵的強弱，之後再影響到個人的行爲。因此不管是學習到的暴力行爲，抑或是社會鍵的形成，這個過程均屬於家庭社會化(family socialization)的一部份，青少年實際上就是從各種社會化機制（包括：家庭、學校和同儕等）中，逐漸被培養成爲社會的一員。因此，大多數的研究結果，建議提高父母的教養技巧，附以民主和充滿愛的管教方式，並提供子女良好的成長環境，來減少青少年暴力行爲的可能。但這些觀點卻都掉進了「機械論式」的社會化過程上，換言之，這樣的觀點所關切的是被社會化的個體，是如何被社會化機制所形塑的過程。

個體社會化雖然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但這種學習不能簡單地被化約爲單純的環境壓力、接受灌輸，或純粹的心理因素，而應理解成是環境與人長期不斷競合的連續動態歷程，因此整個社會化過程應被構築在「互動」的層面上（張開城 1993），如果我們視社會化是「環境—人」及「人—人」互動的過程，實質上已肯定了「人」在社會化中能動及積極的一面，亦即「人」有能力在互動中協調和評估他人的行爲，以及本身行爲後的結果。本研究的出發點，並不在於駁斥青少年孩子是被塑造的這個看法，而是認爲：除了關心孩子是如何被外界所塑造外，更應深入思索「孩子是如何看待自己被外界所塑造」，而不只是簡單地將孩子簡化爲無能爲力的「白紙」，誠如熊秉真(2000)在研究古代中國的兒童時，所說：「過去社會多視成人之觀念爲主體，以成人之文化爲主動和自變因素，而以兒童的世界爲被動和因變的對

象。」因此，本研究的理論目的，欲從社會對人或人對行為的單向影響，轉移到把人看作社會化過程中主動的參與者，即青少年既是社會化的對象，也是社會化的主體，青少年並非僅只被動地被社會灌輸，而是能在家庭裡創造出自己的社會性經驗的活動主體。因為，青少年如何看待成人世界的管教及文化，主要還是取決於青少年自己的想法和認知。

台灣社會一向都存在著「不打不成器」或「棍棒之下出孝子」等這樣的教養觀念，父母嚴厲教養子女成為管教的主要核心，但有趣的是，台灣社會的暴力攻擊事件卻沒有比國外嚴重，如果以上述的觀點討論台灣社會，不難發現很有可能這是因為在台灣青少年的知覺中，根本不認為父母責罵或體罰的行徑是不對的，反而很有可能認為如果父母不管我或在我不對時不責罰我，才認為父母的教養行為是不對。就以「關係」為主（李美枝 1998）的台灣社會而言，青少年在家中所知覺到的「親子關係」之品質，便很有可能成為父母對子女教養行為下的重要機制。基於以上的論述，本文將嘗試從家庭社會化過程的觀點，加上青少年知覺的「親子關係」，來探討父母的教養方式如何影響著青少年暴力行為的發展，同時探討青少年知覺的親子關係在這個影響過程中扮演著何種重要的角色。

二、文獻探討

（一）暴力行為的理論回顧

自二十世紀初以來，暴力或攻擊行為就受到心理學家的高度重視，其相關理論一直籠罩著強烈心理學式的思考，較著名的有「本能論」(instinct theory)、「行為主義」(behaviorism)及「認知訊息處理理論」(cogni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等，他們在各自的理論假設中，分別指出攻擊行為的成因，但由於這些理論具有過度濃厚的心理學色彩，沒能從家庭環境對人影響的觀點，剖析出暴力行為的成因。另一方面，國內外過去已有相當多的文獻，以實證研究的方式檢視 Bandura

的「社會學習理論」，以及 Hirschi 的「社會鍵理論」，並且提出了不少整合這兩個理論的理論模型，只是這些研究也同樣掉在相同的問題困境中。

首先，就社會學習理論而言，固然具有它的洞悉力，但對於影響青少年的環境因素之過程面，卻缺乏更深入的探討。在我們的生活世界裡，存在著「實際」與「認知」的兩個環境，所謂「實際」環境指的是確實發生的行為或事件，例如父母有沒有打罵，而「認知」的環境則是個體對環境的主觀態度，所建構出的一個個體本身所感知的環境。Karl Bauman and Lynn Fisher (1986)曾經針對友伴與青少年間的吸菸與喝酒行為作研究，其研究發現青少年所認知到的友伴行為較友伴實際的行為具有更好的預測力，即青少年所認知的友伴吸菸與喝酒行為，才是影響他有沒有此種行為的危險因子，其後 Ronald Iannotti and Patricia Bush (1992)所作的研究也驗證支持這個理論觀點。

Hirschi (1969)的社會鍵理論，主要是指出個人與社會間的連繫機制，他特別提出了四個重要元素，分別為：依附(attachment)、參與(involvement)、承諾(commitment)和信念(belief)，如果個人缺乏與社會的連繫，亦即若此四項要素偏低，便容易激發個人犯罪的因子。但問題是這四個要素，並非自動地在個人身上產生，它必須透過個人與家庭等的社會化機構接觸，而在社會化過程中逐漸的形成。所以，本研究在前言中指出：這兩個理論的核心均是建立在「社會化過程」理論上，故在說明父母管教對青少年行為的影響上，社會學習理論會從子女學習或模仿父母行為去思考，因而產生上面所說的「實際」與「認知」不分的問題，而社會鍵理論也同樣遇到相同的困境。在此，我們要再次強調的是，這兩個理論所共享的「社會化」觀點，大致上是成立的，只是社會化過程的內涵，並非只是單純的由暴力環境（這裡指的是父母嚴厲與監控的教養行為）到青少年行為，而應補入青少年個體能動的主體面，亦即青少年是如何看待環境影響的面向，才能進一步強化社會化理論的適用範圍。

（二）研究青少年期暴力行為之重要性

最近有關青少年發展的研究逐漸著重在個人的發展軌跡上，用以探求時間因素對青少年發展的重要性(Jang 1999; Overbeek et al. 2001)，尤其關注生命歷程(life course)、軌跡(Trajectory)、個人發展(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及轉捩點(turning point)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Hagan and Palloni 1988; Sampson and Laub 1995; Thornberry 1997; Hoffmann and Cerbone 1999; Simons et al. 2002)，因為關鍵的發展階段，很容易成為生命旅程中的重要事件。在過去的文獻中，不管是自陳問卷或官方資料，都指出青少年中期階段的偏差行為最為活躍(Gottfredson and Hirschi 1990; Elliott et al. 1989)，實際上就青少年問題行為來說，基本上是一個在家庭與同儕脈絡引導下的縱貫軌跡，因此由個人早期的生活進程即能看出日後同儕對青少年行為發展的效果(Cairns and Cairns 1995)。

正由於青少年階段是由兒童蛻變至成人的重要時期，我們雖不排除暴力行為與年齡的關係可能由於性別或其他社會性因素的干擾，而不必然呈現簡單的直線軌跡，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個體從兒童發展至青少年階段，其暴力行為在「質」上的殘忍和暴戾性是逐漸增加的(Eron et al. 1983; Cairns and Cairns 1995)。Garnier and Stein (2002)在為期 18 年的縱貫研究中，指出了早期家庭經驗、不良同儕對青少年偏差行為與藥物濫用有關，而且在藥物的議題上，母親早年的用藥經驗是經由同儕的用藥再來影響青少年個體；實際上，這樣的結果無疑是告訴我們，早期之生活經驗對於個體日後的友誼互動，存在著增強及類聚的效果。加上，青少年在發展時期的問題行為雖然林林總總，但一般都可隨著時間而逐漸消失，但青少年暴力及偏差行為卻未能在成長的歲月中消失，反而與日後的藥物濫用、犯罪行為或心理症狀等密切關連（黃惠玲、林銘塗 1993），不少的研究已經相繼指出，早年的暴力行為與日後的暴力犯罪間存在穩定相關性(Coleman 1992; Kauffman 1993; Straus and Kauffman 1994; Garnier and Stein 2002)，由於青少年期的行為能延伸至成年階段，因此青少年時期的行

為取向，成為預測未來個人生活適應的重要指標(Magnusson et al. 1983; Craven 1997)，正如俗語所言之「細漢偷挽瓠，大漢偷牽牛」。因此，對於青少年暴力行為的研究，將有助於理解日後成人的暴力犯罪成因。

(三) 父母教養與青少年暴力行為

「教養」(parenting)一般來說是指父母對子女的管理與社會化的行為或方式，屬於父母有意識、有計畫的社會化行為(葉光輝 1995)。對於教養方式的分類，不論是西方或台灣的文獻皆相當豐富(可參考周玉慧、吳齊殷 2001)，但是不管如何分類，可以確定的是：如果父母早年以嚴酷的方式教養孩子，則這教養經驗與後來子女的暴力行為有關(Baldwin et al. 1989; Dodge et al. 1992)，或者父母對子女缺乏適當的監控，也易於使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Jang and Smith 1997)。另外有研究指出，父母的管教方式對子女的社會發展有一定的影響力(Zahn-Waxler et al. 1979)。Augustine Brannigan 等人(2002)以加拿大兒童(4-11歲)的樣本發現「敵意的管教」(hostile parenting)導致兒童不規矩及暴力的行為，也有不少研究直接指陳，父母親不當的教養是日後青少年暴力行為的主因(Gibbons 1976; Smith and Thornberry 1995)。國內以台北市青少年作追蹤的研究中，也證實了父母不當教養是青少年行為問題的關鍵(吳齊殷 2000；周玉慧、吳齊殷 2001)。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父母會透過對子女的管教行為與態度，來傳遞其信念與價值觀，並藉由家庭的親子互動，內化到子女身上，然後反映在子女的人格與行為裡(Maccoby 1984)，因此整個問題是環繞在家庭社會化過程之成敗上(Linda 1998)。

其中代間傳承的觀點，正體現出家庭社會化的特點，從代間傳承的觀點觀之，暴力行為本身是父母與子女在生活過程中，從上一代傳到下一代的過程(Lackey et al. 1995)，但對於這種傳承的機制，卻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為直接路徑(Simons et al. 1991; 吳齊殷、高美英 1997)，另一為間接路徑(Bandura 1986)，但就其內涵而言，兩種不同

的路徑，所指涉的仍是下一代如何學習或仿效上一代的行為，不同點只在過程本身機制的差異。這樣的觀點固然給予我們有關子女行為與父母關連間的重要啓示，不過卻存在著一些疑問，就上一代對下一代嚴厲教養來說，子女不斷地受嚴厲的教導，無疑會在潛移默化之下認為嚴厲與暴力是一種合理或者可行的行為，進而模仿及學習，但重要的關鍵點是，為何有些父母同樣是嚴厲，子女卻沒有傳承到這些暴力的行為，因此這個問題並不是單單使用「傳承」的概念就可以解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過去對於青少年教養行為的研究，較著重於母親對青少年的影響，父親的影響則較少著墨（如：吳齊殷、陳易甫 2001; Garnier and Stein 2002¹）。大部分的研究論點，多認為母親是子女的主要照顧者，所以青少年行為問題與母親有著重要關連性(Sears et al. 1957)，因此見諸許多台灣較大型的調查研究，在訪問青少年受訪者的家長時，如果有經費上的考量，只能訪問一位時，多優先訪問母親，如果母親真的無法回答，第二順位才到父親，可見父親在教養或管教的角色上並沒有被充分地重視。另外一類的研究，討論「父母」如何影響青少年時，籠統地把父和母混為一談（大部份的研究是將父跟母的分數加總）。事實上，親子間的連結應該區分為父與子女和母與子女的關係。因為，母親較為影響到女孩的友誼，父親則對男孩有影響(Parke and Buriel 1998)，或者從父母與子女的相處情形去看，可以發現父親較少與子女相處(Coltrane 1995)，而母親則成為子女的主要照顧者(Kumpfer and DeMarsh 1986)。最近已有不少的研究注意到這方面的盲點，開始分別地探討父親對子女的影響（例如：Nugent 1991; Daly 1995）、比較父母管教行為上的差異（吳明燁 1998）、或比較父與母對青少年行為的影響（例如：Rothbaum et al. 1995; Kindlon and Thompson 1999; 吳齊殷 2000）。在一項青少年行為問題的縱貫研究指出，母子間的關係可以有效預測日後的行為，而父子間的關係卻不能

1 在 Garnier and Stein (2002)的研究中，也特別於限制部分點出了沒有討論到父親，是她研究的重要限制。

作為有效的預測指標(Rothbaum et al. 1995)，這些研究成果，提醒了我們父母教養的差異對青少年的影響。Tan-Lei Shek (1995, 2000)有關香港華人社會的研究結果更進一步指出，子女對於父母教養的知覺是有差異的，父母在青少年心目中具有不同的模樣，父親較之於母親有較少的互動及關心，卻有更多的處罰，簡單來說在華人的社會中，正是處於類似「嚴父慈母」的傳統觀念下。父母對子女的影響除了一般觀念的差異外，更存在著父母性別角色分工上的差異，國內吳明燁(1998)對青少年的研究，指出了父母對小孩的管教有不同的分工，父親偏向直接性的，而母親則偏向間接性的，不過文中也指出了一些可能的干擾因素，如母親是否有職業以及父母的教育程度等，不過整體的結果並沒有拒絕父母管教在性別角色上的差異，並且與國外的文獻(Hochschild 1989)所說的，父親為「工具性」角色，而母親則為「情感性」角色相似。因此父母各自的管教行為，對子女的影響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或者說有不同的機制影響著青少年的發展，如果我們仍一味統以家庭教養或母親管教，視作青少年發展的家庭因素，有可能無法有效地掌握父母各自的機制為何，因此有必要討論父母分別如何對子女產生影響。

(四) 父母教養與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關係

暴力青少年大部分是在具有暴力的環境下成長 (Hausman et al. 1994; 陳毓文 1999)，正如劉向所說「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然而，我們往往也會看到，在暴力環境下生長的孩子卻不一定是暴力行為者，更重要的，所謂不當的管教，在不同的人心目中有不同的定義方式，如 Dan Kindlon and Michael Thompson (1999)指出美國社會要求男孩奉行「鐵的紀律」，因此嚴酷教養成爲鞭策男孩成長的工具。事實上，這個觀念在華人社會也同樣受用，試想想我們常說的「男兒當自強」或「棒下出孝子」的俗語，加上對於家庭來說，男孩本身就是家庭的支柱，所以更會以較嚴厲的管教態度

以「望子成龍」。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當父母不採適當的管教，很有可能讓小孩認為父母對其缺乏關心，更說不定認為責罵、體罰是應該的，缺乏適當的監督才是不當。在管教上父母雖然比子女擁有更大的權力，但親子間並非穩定的上下權力關係，它會在互動中，逐漸建構出一種競爭的關係(Fish 2000)，尤其青少年對父母的知覺，更會影響到雙方的關係。

過去對於青少年知覺父母行為的研究，在有關華人社會的研究中，已有一些發現。Shek and Hing-Keung Ma (1997)探討香港青少年知覺到父母教養方式對其社會行為的影響時，發現父親溫和及仁慈的教養方式會減少青少年反社會行為的表現；Ma等人(2000)在區分不同成就認同的高中生，也同樣發現知覺父母影響以及親子關係與同儕關係有助於青少年的正向行為，相對地也降低了反社會行為的傾向。總的來說，父母對子女的影響，不在於他們的行為，而在於子女對父母的知覺為何(Acock and Clair 1986; Acock et al. 2002)。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最能體現子女對父母知覺的好壞，莫過於親子關係，² 葉光輝(1995)指出在家庭社會化歷程中，子女的行為能否如父母所預期，親子間的互動關係為相當重要的關鍵因素。因此過去有不少研究從親子關係以及家庭互動來探討偏差行為(Liddle and Hogue 2000)，從過程的角度著眼，親子關係中的溫暖(warmth)、感情(affection)、接受(acceptance)和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皆與青少年偏差行為有負相關(Blaske et al. 1989)。Cernkovick and Giordano(1987)分析美國 12 到 19 歲的青少年，發現當青少年回答親子關係越佳時偏差行為的自陳分數也相對較低，國內羅國英(2000)就曾以「親子關係知覺」，來探討父子雙方的互動情形，發現親子之間常有知覺不一致的情形。Irving Sigel (1985)在討論親子關係的研究發展時，就特別指出 1920 至 1930 年代

2 有部分研究會將教養行為放在親子關係的架構下，本文特別將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分離，主要原因在於教養行為偏向於外在可見、可感覺的事實，即父母實際上如何管教小孩，而親子關係則為父母與子女間不斷互動下所產生的一種感知，一種無形的相互連結，本文欲從「實際」與「感知的關係」間，重新檢視其間的內在機制。

的家庭研究，多半受心理學行為主義的影響，研究問題集中在父母管教方式與行為間的關係，直到 1970 年代，受到社會心理學和認知心理學的影響，親子關係的研究不只討論客觀之行為面，更開始注意到父母在教養時的內在認知歷程和信念，與子女行為發展的關係（林惠雅 1999）。不過，在國內有關親子關係的研究，仍然停留在親子關係內涵的分類，或者籠統地把父母與子女的互動過程放在親子關係的層次上，作為依變項來預測某些問題，很少討論親子關係被影響的過程，以及對於家庭系統的內在機制為何，Videon Tami (2002) 就曾以父母離異來探討親子關係品質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實際上類似的課題，應為日後相關研究的重點。

（五）「教養」與「暴力行為」的可能機制

以上的說明，綜合指出了「教養」、「親子關係」以及「青少年知覺」等三個因素在青少年行為發展上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問題行為方面）。不過，正如第三節所說，過去的研究或傳統理論，是直接探討父母教養或者親子關係對青少年暴力或問題行為的影響（以下以「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稱之），他們雖然以自身不同的理論立場來討論青少年問題行為的成因，但其所建構的研究架構，基本上大同小異，即父母不當教養對青少年問題行為的直接影響，其中，社會學習理論認為是透過「模仿」或「漸染」的機制，指出青少年是學習到上一代的行為，而社會控制理論則認為父母的不當管教，導致青少年沒有形成有效的社會連結，進而導致子女脫軌而從事違規的行為。如同之前所說，無論是以何種觀點去解釋，他們實際上均建構在社會化的過程上。

我們認為社會化過程不應只被看作為被動的主體（青少年）如何被社會化，而應放在「環境—人」及「人—人」互動過程面上，尤其是青少年的知覺與感知，如何在環境與人之間產生作用。可惜，在過去大量的文獻中，很少將他們放在同一個過程脈絡的架構上討論，因而沒有清晰地尋找出教養行為與親子知覺關係間，到底是如何對青少

年暴力、偏差或違規行為產生影響。究其原因有二：其一為方法上的原因，過去大部分的研究是仰賴橫斷面的資料進行分析，在進行因果機制的驗證時，會遭遇到因果關係時序的難題，而且由於資料的限制，大部分的研究結果多以迴歸分析或零序相關進行（以上所引的大部分研究均有此限制）(Lin 1976)，因此過去的研究大多只能指出教養或親子關係對青少年行為的影響力。其二為理論上的原因，由於過去的理論觀點，主要是試圖在環境因素上找原因來解釋問題行為，而且大多社會化歷程建立在單線性的基礎上（葉光輝 1995），致使大部分的觀點或理論，均放在父母對子女的直接影響上。但問題是，父母直接的影響機制卻存在著主體為被動者的困境，即前言所說的，對於青少年行為的影響機制，不應單純由行為（父母教養行為）直接解釋行為（暴力行為），更應注意到青少年主觀認知的面向。

社會學習理論大師 Bandura (1986)在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一書中，進一步修正前期的社會學習理論，並提出了以「環境」、「個人」與「行為」三者交互影響為基礎的「三元交互決定論」(triadic reciprocal determinism)，此觀點除了從外在環境找尋原因，還回過頭來就個人的認知（即個人如何看待外在環境）來解釋行為的原因，而且他的觀點更進一步指出三者間並不是單線性的關係，而是一種交互的關係。這樣的觀點無疑跳脫了環境對行為影響的化約解釋，同時更能清楚地描繪出「知覺」或「認知」等個人主觀的變項，在青少年行為發展中作為中介或調節的橋樑角色的可能性。簡單而言，譬如，母親常常作出嚴厲的處罰，如果子女主觀上認為這樣的處罰是合理的，是關愛自己的具體表現，則這樣的處罰在青少年的主觀認知下可能就不是處罰，這種善意的解讀，可能使得父母的嚴厲教養不會影響到青少年行為的發展。

就 Bandura (1986)的觀點論之，個人的認知或知覺確實是行為發展機制中，重要的中介或調節的橋樑。不過，國內外依照此理論，同時兼有討論到教養、親子關係與青少年行為的文章卻為數甚少，在國外較為突出的，有 Ronald Simons 等人(2000)的台美青少年偏差行為的

跨文化比較研究，他們透過階層迴歸模型之交互作用項及平方項的方式，對父母處罰與子女反社會行為間的關係進行分析，他們的研究發現，美國樣本的父母處罰行為與「溫暖／控制」間沒有交互關係，但台北的樣本卻呈現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父母處罰行為與男孩反社會行為間「溫暖／控制」具有交互的作用，並且呈現一種非線性的變化關係，此論文利用了美台兩地的資料，重新勾勒出父母對青少年影響的跨國性差異，並進一步補充了過去文獻單純以直接機制及線性影響的理路，實為近年難得的著作。就國內而言，近期周玉慧和吳齊殷(2001)對青少年行為的實證研究可說是代表的作品，作者利用階層複迴歸分析尋找教養方式、親子支持及衝突間的交互關連（暫稱為親子互動觀），其結果顯示嚴厲教養（缺乏監督）與親子支持（衝突）對偏差行為間具有交互作用（或稱「調節效果」(moderating effect)³），另外他們更以路徑分析的方法，發現到不當教養會直接影響青少年的關係滿意度，而且更會透過親子間的衝突對偏差行為產生影響；此文並且非常詳細地分析了親子間知覺的差異，以及對青少年的影響為何，其結果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不過正如作者在文中討論所說的，父母與子女不同的互動方式會否形成不同的影響機制，成為接下來重要的議題，也是本文要回答的問題之一，加上該文只利用了橫斷面的資料，在路徑分析的因果推演下，會有因果時序上的研究方法難題。

至於「中介效果」(mediating 或 intervening effect)，最近在台灣也有部分文章，重新建構父母對子女的影響過程，並試圖在家庭與青少年行為間尋找中介機制（章英華 2001），譬如：侯崇文(2001)的研究是在家庭結構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間，發現家庭關係具有中介性；高淑芳、陸洛(2001)則從父母管教態度對國中生考試壓力間，檢視出特質焦慮為兩者間的中介變項。對於將親子關係作為中介變項，在國內有

3 「調節效果」(moderating effect)又稱為「交互效果」(interaction effect)、「條件效果」(conditioning effect)或「列聯效果」(contingency effect) (Vogt 1999)。由於調節一詞，能充份表達出親子關係的程度對於父母教養行為的調節作用，因此本文使用「調節效果」一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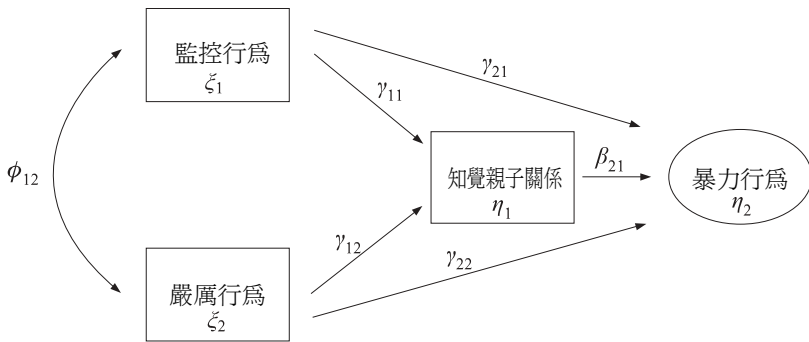
朱瑞玲(1989)就子女對父母教養的歸因來探討青少年行為，她指出父母的教養行為是透過子女正面或負面的歸因過程才會影響到青少年本身；周玉慧(2001)就親子互動、親子關係評估與青少年偏差行為和課業成績進行研究，指出就偏差行為而言，親子正面的支持是透過信任感（親子關係）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國外部分的研究也同樣指出（如：Jackson and Foshee 1998），青少年對親子關係的知覺，某種程度上為教養與子女行為的中介變項，他主要發現父母不當的管教，會加強子女對父母的負面評價，進而影響青少年暴力行為。總的來說：本文欲從個人知覺關係的面向，指出個人對外在環境（父母教養行為）是需要經過個人知覺或認知的詮釋面，再行影響青少年，因此父母對子女可能存在著「調節效果」或「中介效果」的機制，而不應是簡單的「直接效果」。

三、研究架構

從以上文獻部分的討論，教養行為對青少年行為的影響，基本上可歸納出三種可能的機制，分別為：(1)直接效果：指的是父母的教養行為會直接影響青少年的暴力行為面；然如前所述，這個觀點忽略了個體的認知主動性。(2)調節效果：指稱親子關係與教養行為是透過交互作用或某一狀態條件的差異或互動的方式而影響青少年的暴力行為。(3)中介效果：視青少年知覺的親子關係為教養行為與青少年暴力行為間的傳導介面。本研究對各種機制的操作性模型歸納於表一，而圖一則為本研究意欲驗證的理論模型。本研究最終的目的在於回答父母教養行為與青少年暴力行為間，存在著何種的內在機制（是「直接效果」、「調節效果」、「中介效果」或是一種混合各種效果的機制），另外，本文更就「傳統觀念性」及「性別角色分工」下，不同的父母角色，來分析父母對兒子的行為發展影響及機制會有何種的差異。

表一 本研究各種機制的操作化模型

變項間的機制	變項間的關係 (參考圖一)
直接效果	$\eta_2 = \gamma_{21}\zeta_1 + \gamma_{22}\zeta_2 + \zeta_1$; γ_{21} 與 γ_{22} 為 $p < .01$
調節效果	以 $\Delta\chi^2 = \chi_a^2 - \chi_b^2$ 比較 $\eta_2 = \gamma_{21}\zeta_1 + \gamma_{22}\zeta_2 + \zeta_1$ 不同親子關係程度下的 γ_{21} 與 γ_{22}
中介效果	原 $\eta_2 = \gamma_{21}\zeta_1 + \gamma_{22}\zeta_2 + \zeta_1$; γ_{21} 與 γ_{22} 為 $p < .01$ 改爲 $\begin{bmatrix} \eta_1 \\ \eta_2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gamma_{11} & \gamma_{12} \\ \gamma_{21} & \gamma_{22}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zeta_1 \\ \zeta_2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0 & 0 \\ \beta_{21} & 0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eta_1 \\ \eta_2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zeta_1 \\ \zeta_2 \end{bmatrix}$ 則變為 γ_{21} 與 γ_{22} 為 $p > .01$; 而 β_{21} , γ_{11} 及 γ_{12} 為 $p < .01$



圖一 本研究的理論模型

四、研究設計及方法

(一) 資料來源與使用樣本

本研究採用衛生署國衛院所資助的「青少年藥物濫用之起因：一個社會學習模型」(DOH87, 88-HR-621)研究計畫之資料，此計畫之調查母體為台北市 86 所公私立國中學生，抽樣原則採分層二階段等機率抽樣(two-stage PPS)。依台北市 12 個行政區作分層，以學校為「第一抽出單位」，班級為「最終抽出單位」，各階段各單位的抽樣採分

層二階段等機率抽樣為之。最後，此計畫於 1996 年（第一年）共計抽出 33 所國中、44 個班級、1,434 個國一學生為樣本，各階段學校班級被抽取機率皆相等，且使樣本的分配接近母體。本計畫根據以上的抽樣原則，自 1996 年迄今以連續固定樣本追蹤研究(panel study)的方式，連續每年就台北市 33 所國中所抽出的 1,434 個樣本進行追蹤，詳細執行流程如下：首先，於 1996 年 9 月至 12 月間至各個樣本抽出學校，利用課堂時間完成樣本學生問卷之施測，總計有效問卷為 1,434 份；接著，隔年參照第一年各學校聯絡人名單與各校負責人約定各樣本抽出學校施測時間，仍以第一年各校之各個受測班級之所有學生為對象，由本計畫研究助理帶領事先經過訓練之訪員，分別至各樣本班級進行第二年的樣本學生問卷施測，最後恰巧也完成 1,434 份有效問卷；其中，共有 1,354 名學生，連續參與這兩次的問卷調查施測，同一樣本之重複完訪率達 94.4% 左右。第二年實際進行問卷調查期間為 1997 年 10 月至 12 月間。第三年的問卷調查計畫仍依據第一及第二年的調訪程序進行，於 1998 年 10 月至 12 月間至學校進行學生問卷的第三次訪問，最後完訪樣本數為 1,449 份，三年皆參與該項長期追蹤研究計畫的樣本學生共有 1,304 人，三年皆參與之同一樣本的完訪率為 90.9%。

過去有不少文獻已指出 15 至 17 歲為青少年容易出現偏差行為的關鍵期(Tolan 1988)，因此本文將時間點放在國中階段的青少年。另外，雖然有部分文章指出（參見 Heimer and Coster 1999）暴力並不純然是「男性」的現象，性別間的差異內含著社會結構與文化的機制，例如：暴力的定義、家庭的感情連帶及性別定義等，這些研究的發現固然對攻擊及暴力研究領域注入新的思維，但也不否認男性較女性有更高的機會從事暴力的行徑，而且實際上男性也真的較女性表現出更多的暴力行為(Kupersmidt et al. 1995)。正如 Kindlon and Thompson (1999)所說的，男孩是生活在殘忍的文化下，在我們的文化中他們的情感遭到忽略，我們只看到孩子最終的暴力，特別在我們的台灣社會裡，暴力行為在男孩身上比較普遍，而大部分的暴力犯也多為男性。

在華人社會「重男輕女」的家庭文化下，男孩所被賦予的期望與重擔，進而轉化為嚴厲的管教與規訓，在這樣環境下生活的男孩，為何有些會具有暴力行為的傾向，有些則不會？加上就社會實踐面來說，從「男性」身上找出可能的影響因子，對整體社會的暴力犯罪將有所助益，因此，本研究以男性青少年為研究對象。

另外，由於本文是針對父親及母親各自對兒子的影響，再加上本研究的假設是，家庭結構不完整易於培養出不健全人格的小孩，而且這類家庭長大的小孩與一般家庭長大的小孩，可能接受了不同的父母教養，因此本研究在減少不必要的偏誤及鎖緊主題的原則下，只針對國二至國三兩年內與親生父母同住的男性青少年為對象進行研究。經過以上的原則篩選後，本文最後的分析樣本為 564 位男性青少年。

（二）主要變項測量

本研究共有三個主要變項，分別為：「暴力行為」、「教養行為」與「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關係」，大部分的測量是根據國外研究，並參酌本研究所使用的調查資料，修改及建構而成，現將各變項分述如下：

1. 青少年暴力行為

「暴力行為」在不同情境及解讀下，具有多種不同的面貌，譬如在法律人眼中，此一辭彙意含著侵害個人或社會法益的刑事行為，因此他們將行為提升到法律的位階，以暴力犯罪來界定「暴力行為」的型態，就目前政府單位對暴力行為的分類而言，所謂青少年暴力犯罪是指殺人、傷害、擄人勒索、搶奪和恐嚇取財等罪行。由於「暴力行為」含有多樣性的意義，界定何謂本文所指的「暴力行為」概念，對本研究的定位有其必要性。Bandura (1973)指出攻擊暴力行為是一種導致他人身體或財產受損害結果的行為；在社會學辭典中 David and Julia (1998)把“aggressive”界定為一種敵對的心態或行動，一種意圖對他人施加肉體或口頭的傷害行為。基本上過去的研究均將暴力行為注入行為與意圖兩個面向，Simons 等人(1994)的一項青少年調適問題的研究

中，清楚將暴力行為劃分為兩個指標：一為「暴力傾向」(violent orientation)，另一為「敵意」(hostility)。

本研究從國三學生的自陳問卷中的兩個量表建構這兩個指標。首先，「暴力傾向」是使用表二中的六個項目（參考 Simons et al. 1994），各項目的選項分別為 1（有）和 0（沒有），在這六個項目中，受訪者勾選最多的是「有人惹你生氣，所以你揍他或打他」占 27.2%，其次為「玩火，亂燒東西」占 10.7%，接著是「惡意損壞或破壞不屬於你的東西」占 8%；六項中最少人勾選的是「使用武器、暴力或脅迫手段向別人勒索」只占 0.7%。最後由六個項目加總成「暴力傾向」此一指標，分數越高「暴力傾向」越強。然而，由於題目本身具有不同程度的行為傾向，有些題目較為嚴重而有些較為輕微，如果以加總的方式建構此一指標，很有可能產生受訪者為同一分數但行為嚴重性不同的情形，由於此一量表具有古特曼(Guttman)量表題目強弱的特性，可以再製係數(coefficient of reproducibility)⁴ 進行檢測，結果為 96.63%，超過一般所訂 90-95%的標準，因此本文以加總的方式測量的「暴力傾向」，並沒有因題目強弱的特性而造成嚴重的偏誤。

另一個指標則以效度與信度良好的 SCL-90-R 量表(Derogatis 1983) 建構，其中各項目的選項為 1（沒有）到 5（很嚴重），表二是本研究使用的四個項目中青少年勾選「有」的比例，其中最多青少年「有」的項目為「常常和別人爭吵」占 19.3%，其次為「很想要去破壞東西」占 17.6%，接著為「很想要去毆打、傷害別人」占 12.4%，次數最少的為「尖聲大叫或摔東西」只占 4.6%，「敵意」此一指標最後由這四個項目加總而成，分數越高「敵意」越明顯。

2. 教養行為⁵

過去的研究就有關影響青少年反社會行為的教養行為，分出多個不同的面向，包括：缺乏監督(lack of monitoring)、「非引導性」、

4 Coefficient of reproducibility = $\left[1 - \frac{\text{number of errors}}{\text{number of gresses}}\right] \times 100$

表二 國三青少年暴力行為各項目的次數及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暴力傾向的項目		
有人惹你生氣，所以你揍他或打他	153	27.2
玩火，亂燒東西	60	10.7
惡意損壞或破壞不屬於你的東西	45	8
丟小石子或類似的東西傷人	37	6.6
使用武器暴力別人，想害他受重傷	8	1.4
使用武器、暴力或脅迫手段向別人勒索	4	0.7
SCL-90-R 敵意項目		
很想要去毆打、傷害別人	70	12.4
很想要去破壞東西	99	17.6
常常和別人爭吵	109	19.3
尖聲大叫或摔東西	26	4.6

「嚴厲」(harsh)及「不一致」(inconsistent discipline) (Loeber and Dishion 1983; Patterson 1986; Kazdin 1987; Laub and Sampson 1988; 吳齊殷 2000)，尤其「監督」與「懲罰」(或「嚴厲」)更為父母管教的兩個主要方向(Patterson 1982; Larzelere and Patterson 1990; Carter 2001)。在一項針對台北市學生的研究中(周玉慧、吳齊殷 2001)同樣反映出「監督」與「嚴厲」教養對青少年偏差行為具有影響力，鑑於過去研究一再指出這兩個面向的重要性，本文以此作為本研究「教養行為」的兩個指標。其中，「監控行為」分別測量父親及母親，在國二時對小孩的六項實際狀況，內容包括：「是否知道他(她)每天的行踪」、「知道他(她)跟誰在一起」、「討論他(她)的生活種種事情」、「規定他回家與上床睡覺時間」等，主要是要理解父母對小孩狀況的掌握程度。接著「嚴厲教養」測量的是父母實際採取的管教方式，是否在小孩做錯事時，採用「毆打」、「鞭打」、「怒罵」和

5 在國外的文獻裡常用 parenting practice(中文大多翻譯為「教養實施」)，來表示父母對子女管教的方式及措施，由於 practice 包含了經常與實際行動的意涵，因此較單純的「教養行為」(parenting behavior)的意義來得廣，不過如果翻譯成「教養實施」可能造成讀者的困擾，故取折衷的辦法是英文沿用國外文獻的 parenting practice，但中文內文卻使用「教養行為」來代表。

「趕出去或鎖在門外等四題(Simons et al. 1994)。以上各題為五點量表，選項分別為由 1（沒有）到 5（總是），變項的處理方式，是將受訪者各面向的每個項目之得分加總而成，因此對於「嚴厲教養」而言，分數愈高表示父母親在此教養指標上愈不當，反之，如果「監控行為」的分數越高代表父母親越能掌握兒子的動向。

3. 知覺親子關係⁶

本研究主要從歷程的脈絡來討論暴力行為是如何受到家庭的影響，因此青少年對親子關係的評估成為本文的核心，過去一些相關的文獻，以正面的關係或支持滿意程度作為衡量親子關係的重要指標，例如 Videon Tami (2002)採用關係的滿意程度，來探討父母離異後對親子關係品質的作用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本文以青少年國二時回答的四個項目，作為本文的「親子關係」。首先，第一個是「是否滿意與父親（或母親）之關係」，選項為 1（非常不滿意）到 4（非常滿意），為四點量表，其次為兒子回答父母親是否很相信自己，為五點量表，接著為兒子是否尊敬父母，最後，是看兒子與父母的相處中，兒子喜不喜歡與父母在一起，亦為五點量表。「親子關係」就是以此四個項目加總而成，因此分數愈高表示此青少年與父親（或母親）之關係越好，用以捕捉青少年對父親（或母親）所知覺的觀感。

（三）分析方法與策略

本研究主要是以次數、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t 檢定及零序相關係數分析，作初步的資料分析與變項描述，接著再以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作模型比較及資料分析。模型比較採取兩組有階層性的巢狀模型(two hierarchically nested model)求兩

6 本文以「知覺親子關係」(perceptions of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來代表兒子對父親（或母親）之關係的評價，在國內的文獻裡，羅國英(2000)將這個概念譯成「親子關係知覺」（雖然本文與她的測量並非完全相同，不過概念類似），但也有一些文章在使用「知覺」的概念時，會把「知覺」放在前面，如知覺父母教養行為。由於知覺在本概念中看為動詞，故本文為求容易理解，稱作為「知覺親子關係」。

者間的「改變卡方值」($\Delta\chi^2$ 或 χ^2 difference; change chi-square)，進一步作 $\Delta\chi^2$ 的假設檢定(Kelloway 1995)，SEM 的計算是使用套裝軟體 LISREL8.54 進行。本文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步驟，首先是透過 PRELIS 將原始資料以 Listwise 的方式處理遺漏值，進而將模型中各指標轉換成「共變數矩陣」，繼而藉著「共變數矩陣」運用 LISREL8.54，以 Syntax 撰寫出各模型的關係，其中本研究的「起始值」(starting value)均設定為 1，參數以「最大概似法」作估計，模型 $\Sigma = \Sigma(\theta)$ 的適合度，採用 χ^2 (chi-square 值)、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Goodness of Fit Index(GFI)、Comparative of Fix Index (CFI) 等四個指標，各參數的結果及模型則以 VISIO 2000 繪畫成模型圖，至於各參數的估計結果以完全標準化(Completely Standardized Solution)呈現。使用 SEM 的原因，在於 SEM 能有效地在結合「路徑分析」和「因素分析」之條件下，比較多個模型以驗證假設(Byrne 1998)，多群組樣本的比較模型，正好能提供本研究釐清「親子關係」在「教養行爲」與「暴力行爲」間的關係及可能的關連。

五、分析結果

本文的分析結果，是從最簡單的描述統計開始，以簡單的統計分析指出教養行爲與青少年暴力行爲之間的可能關連，接著第二節以多群體結構方程模型，比較「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關係」是否為教養行爲與青少年暴力行爲的調節關係，第三節則以結構方程的模型比較，驗證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關係作為中介的影響過程，最後，為解答父母對兒子機制的差異，是否為各自教養行爲內涵差異的緣故，進一步分析父母教養行爲間的差異比較，以檢視本研究的理論模型。

(一) 教養、親子關係與暴力行為之基本描述及差異比較

根據受訪學生於國二及國三時之自陳問卷，可以發現到他們對父親及母親教養行爲有不同的評價，從表三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就監控

表三 父母監控、嚴厲教養與親子關係之比較

國二階段		平均數	標準差	全距	樣本數	t-test
監控行爲	母親	21.99	4.81	6-30	558	11.37*
	父親	20.63	5.25	6-30	558	
嚴厲教養	母親	5.72	2.53	4-20	562	-.042
	父親	5.72	2.55	4-20	562	
知覺親子關係	母子	16.60	2.85	4-19	559	2.69*
	父子	16.36	2.98	4-19	559	

* $p < .05$

行爲而言，國二階段母親的平均數爲 21.99 而父親則爲 20.63，以 t 檢定作差異比較，也顯現出兩者間具有顯著差異，代表了在國二階段母親較父親更掌握其小孩的動向，也更清楚他平日的狀況；其次，對於嚴厲教養來說，父母親國二階段的平均數皆爲 5.72，兩者並無差異；接著，比較國二階段父親與兒子以及母親與兒子的關係時，同樣呈現出兒子所評價的母子關係較之於父子間的關係爲佳（父子的平均數爲 16.36，母子的平均數爲 16.60， $t=2.69$ ， $p < .05$ ）。

進一步分析，父親及母親各自在教養、親子關係與暴力行爲間的關係時（見表四），可以發現母親的監控行爲、嚴厲教養與敵意間有關連性（ r 在-.15 及.16），但與暴力傾向並沒有關連，代表母親對兒子越掌握及監控得越佳，越不容易有敵意的行爲，如果母親在管教上越嚴厲則更有可能形成兒子的敵意行爲；相對地，父親在監控與嚴厲上皆與暴力傾向及敵意有關連（ r 在-.19 到.15 之間），表示父親於這兩個教養面向上越不當越有可能造成兒子的暴力傾向與敵意行爲。接著表四更呈現出，不論是母親或父親的監控行爲及嚴厲教養皆與親子關係有著顯著的關連（ r 在-.37 到.37 之間），意味著父母監控兒子越好與兒子的關係越好，但如果父母管教越嚴厲，他們與兒子間的關係越是惡劣。其次，要注意的是，不管是父或母在監控與嚴厲間均有負相關（ r 在-.14 到-.18 之間），這個結果與國外的研究相一致（如：

表四 父母教養與暴力行爲間的零序相關係數矩陣

	父親(N=555)	1.	2.	3.	4.	5.
母親(N=556)						
1.監控 (國二)		—	-.18**	.37**	-.09*	-.19**
2.嚴厲 (國二)		-.14**	—	-.35**	.09*	.15**
3.知覺的親子關係 (國二)		.33**	-.37**	—	-.12**	-.21**
4.暴力傾向 (國三)		-.04	.08	-.10*	—	.23**
5.敵意 (國三)		-.15*	.16**	-.22**	.2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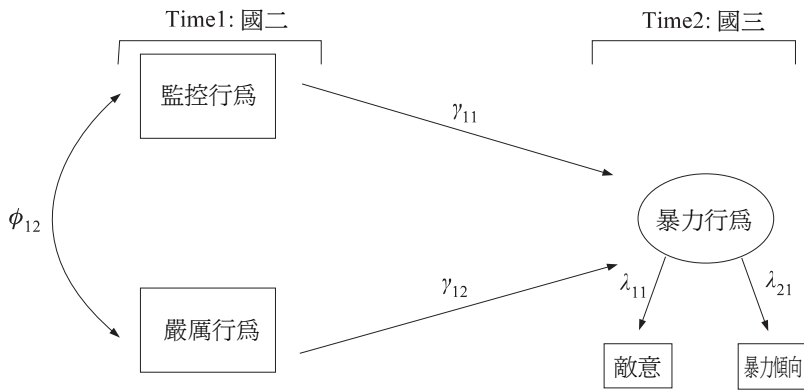
註：「暴力傾向」使用偏差行爲量表；「敵意」使用 SCL-90R 量表

* $p < .05$, ** $p < .01$

Loeber and Dishion 1983; Patterson 1986; Kazdin 1987; Laub and Sampson 1988)。總的來說，以上的基本分析說明了在教養行爲及親子關係上，兒子對父親的評價較母親來得差，這樣的結果可能與母親作為主要照顧者的角色有密切關係，普遍來說母親由於與子女的長時間接觸，較容易形成一種比父子關連親密的關係(Sears et al. 1957)，於此，我們在各變項的相關分析裡，也發現到父或母在各變項間的關係上並非完全相似，但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父母親的管教行爲以及親子間的關係皆與兒子的暴力行爲有關。所以接著需要繼續追問的是，暴力行爲是如何受父母親所影響？而父親或母親對青少年行爲的影響有沒有差異呢？

(二) 親子關係作為父母教養行爲與暴力行爲的調節效果

表四的分析基本上與過去研究（例如：Gibbons 1976; Smith and Thornberry 1995; Jackson and Foshee 1998）所指出的父母教養對子女攻擊或暴力行爲有關的命題相同。表五所檢視的結構方程模型，無論是母子($\chi^2 = 0.36$; $df=1$; $p > .05$)或父子($\chi^2 = 0.36$; $df=1$; $p > .05$)皆顯示出資料並沒有拒絕模型，接下來看父母對兒子的 γ_{11} 和 γ_{12} 均為顯著，代表不論是父或母的「監控行爲」及「嚴厲教養」對青少年暴力行爲來說，皆有影響力，即文獻討論的「直接效果」。



圖二 父母教養與暴力行為之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表五 以親子關係作為調節變項之結構方程模型各係數摘要表

	母親—兒子			父親—兒子		
	全體	關係佳	關係差	全體	關係佳	關係差
路徑						
γ_{11}	-.16**	-.13	-.12**	-.24**	-.13	-.26**
γ_{12}	.19**	.14	.15**	.17**	.17	.18**
ϕ_{12}	-.15**	-.20**	-.02	-.20**	-.15**	-.11
攻擊行為						
λ_{11}	.31	.58	.16	.35	.77	.24
λ_{21}	.76	.45	1	.68	.39	.81
樣本數	559	303	255	559	291	265
χ^2	.36	.43	.41	.36	.37	0
df	1	1	1	1	1	1
RMSEA	0	0	0	0	0	0
GFI	1	1	1	1	1	1
CFI	1	1	1	1	1	1

* $p < .05$, ** $p < .01$

為尋找兩者間的關係機制，以求理解教養行為對暴力行為間的影響，是否會受到兒子所認知的親子關係所左右而有「調節的效果」，以下的分析便將親子關係分為「關係佳」與「關係差」，根據的標準乃是「國二受訪者所評量的親子關係之標準分數，是否高於或低於其標準差（標準分數大於或小於 0）來衡量（可參考 Cohen and Cohen 1983; Aiken and West 1993; 周玉慧、吳齊殷 2001）。表六，上方指的是母子關係差，下方則為母子關係佳，從表中的分析結果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母子關係佳時，監控行為、嚴厲教養與暴力行為皆不顯著，但相對地，如果關係差時，監控行為、嚴厲教養與暴力傾向有相當程度（ r 分別為.20 及-.16）的相關，接著若每一個變項逐一比較「關係佳」與「關係差」兩群的平均數，可以得出母子關係差較之於關係佳有更高顯著的嚴厲教養以及暴力行為的平均數得分，而有較低的監控行為。

表六 教養與暴力行為間的零序相關係數矩陣及平均數差異比較

關係差 關係佳		1.	2.	3.	4.	平均數	標準差	樣本數	t-test
									與低比較
1.監控（國二）	母親	—	-.02	-.16**	-.01	20.71	4.69	256	5.95**
	父親	—	-.11	-.22**	-.07	19.03	5.04	265	7.31**
2.嚴厲（國二）	母親	-.20**	—	.20**	.05	6.27	2.86	256	4.81**
	父親	-.15*	—	.17**	.05	6.22	2.83	268	4.74**
3.暴力傾向（國三）	母親	-.09	.06	—	.21**	.69	1.14	257	2.73**
	父親	-.08	.06	—	.19**	.71	1.18	268	3.40**
4.敵意（國三）	母親	-.08	.11	.26**	—	4.86	1.93	257	.80
	父親	-.11	.15*	.30**	—	4.81	1.81	268	.28
平均數	母親	23.07	5.26	.45	4.73	—	—	—	—
	父親	22.12	5.23	.42	4.76	—	—	—	—
標準差	母親	4.65	2.12	.87	1.74	—	—	—	—
	父親	4.95	2.01	.78	1.83	—	—	—	—
樣本數	母親	303	305	305	305	—	—	—	—
	父親	291	292	292	292	—	—	—	—

* $p < .05$, ** $p < .01$

從表六來看，父子間的關連基本上與母子相同，即關係差的一組有較高的不當教養及暴力行為，在相關係數上，也傾向父子關係差兒子較有可能表現出暴力行為。但有一點需要說明，在關係佳中卻有嚴厲教養與敵意($r=.15$)存在顯著的正相關，為何有這個結果，是否是偏誤抑或是其他具理論性的意涵，加上零序相關矩陣及平均數差異比較，只是針對一兩個變項作比較，並沒能勾勒出一個可能的預測路徑，及比較不同群組間的差異(Byrne 1998)，因此以下的分析有必要更進一步以結構方程模型的策略來解構箇中的關係。

為探求父母教養中的「嚴厲教養」及「監控行為」兩個面向，是否會藉由子女對親子關係的不同知覺而有不同的結果，以下的分析沿用以上親子關係的二分方法，將子女所知覺的「親子關係」區分為「關係佳」及「關係差」兩群，再透過 LISREL8.54 進行多群組的模型比較。本研究所檢測的模型如圖二所示， γ_{11} 和 γ_{12} 分別為「監控行為」和「嚴厲教養」對「暴力行為」的影響路徑，表五是青少年知覺親子關係作為調節變項時，各模型參數的結果，其中不論是父親抑或母親模型適合度的指標 χ^2 均顯示資料並沒有拒絕模型，接下來觀察各參數的結果，可以發現關係佳與關係差兩組的結果，各路徑有不同的顯著傾向，與以上利用零序相關分析的結果相似，但為求確實比較兩個模型的差異，以下將以多群組模型比較的方式作父與子及母與子的比較。

表七是就母親對兒子的模型，在兩種不同的關係程度下所進行的分析結果，從表中的結果得知，「監控行為」和「嚴厲教養」對「暴力行為」的兩條路徑，在各自固定其他可能的關係後，兩條路徑的「改變卡方值」均不達顯著 ($\Delta\chi^2 = 1.09, 2.58; df=1; p>.05$)，並沒有拒絕「基準模型」(baseline model)因而接受「對立模型」(alternative model)，即表示母與子模型中，不同關係程度在此兩條路徑上均沒有差異，進一步看其估計的結果皆為顯著 (分別為 $\gamma_{11} = -.14$ 及 $\gamma_{12} = .17$)。

接著表七中父親對兒子模型的分析結果，從表中可以清楚看出，以兩種不同關係程度作比較模型後的結果，基本上與母對子模型的結

果相同，即「改變卡方值」均為不顯著，沒有棄卻「基準模型」，代表 γ_{11} 和 γ_{12} 這兩條關係路徑在不同關係程度下並沒有差異存在，而兩條路徑的係數皆為顯著（分別為 $\gamma_{11}=-.20$ 及 $\gamma_{12}=.17$ ）。總的來說，一開始所使用的零序相關及 t 檢定分析策略，呈現出子女知覺親子關係的不同，會影響到父母教養與兒子暴力行爲的關係，這樣的結果基本上與過去的研究相類似(Gibbons 1976; Smith and Thornberry 1995)，但接下來的問題卻是「孩子所知覺的親子關係，是如何影響到父母教養對兒子暴力行爲間的關連」，表七的分析結果是透過結構方程模型的多群體比較，藉由條件分析 (conditional analysis) 的策略，用以回答「在孩子所知覺到親子關係的兩種不同品質下，父母教養對兒子暴力行爲的影響是否會有不同」（換句話說，即親子關係是否為本研究模型的「調節變項」），分析結果顯示，親子關係無論是在父對子或母對子的模型，均不具有調節的作用，即沒有「調節效果」。如果親子關係沒有調節性，那麼到底孩子知覺的親子關係，在父母教養影響兒子暴力行爲中具有何種意義呢？有無中介的可能呢？

表七 比較不同關係程度組的路徑差異：母親－兒子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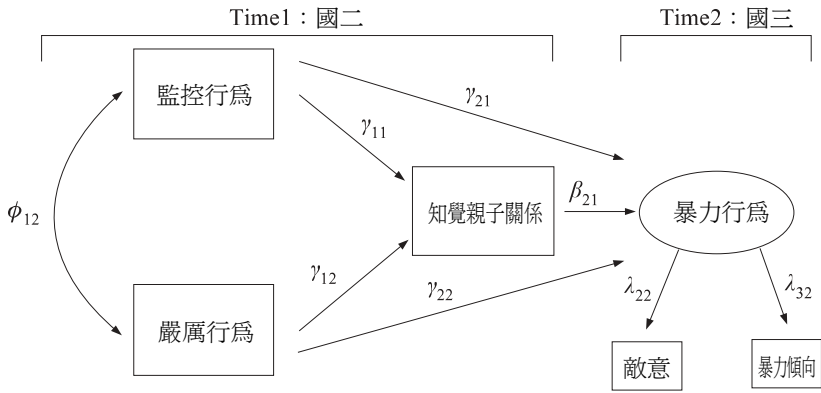
模型	描述	對象	關係佳	關係差	χ^2	df	$\Delta\chi^2_{(1)}$	p-value
監控→暴力 (γ_{11})								
基準模型	關係程度佳模型等於	母→子	-.14*	-.14*	7.98	5	1.09	p>.05
	關係程度差的模型	父→子	-.20*	-.20*	11.36	5	2.85	p>.05
對立模型	所有路徑固定後，分別求	母→子	-.08	-.21*	6.89	4		
	監控對暴力行爲的路徑	父→子	-.33*	-.09	8.51	4		
嚴厲→暴力 (γ_{12})								
基準模型	關係程度佳模型等於	母→子	.17*	.17*	7.98	5	2.58	p>.05
	關係程度差的模型	父→子	.17*	.17*	11.36	5	.31	p>.05
對立模型	所有路徑固定後，分別求	母→子	.05	.23*	5.40	4		
	嚴厲對暴力行爲的路徑	父→子	.21*	.10	11.05	4		

*p<.05

(三) 親子關係作為父母教養行為與暴力行為的中介關係

從以上的分析確認了「監控行為」與「嚴厲教養」兩者對「暴力行為」的影響力，接下來圖三的結構方程模型是在圖二⁷的基礎上，再加上兒子所知覺的「親子關係」此一中介變項。透過表八的說明，可以發現在將所有可能的路徑作自由參數估計時，在母親對兒子的模型一中 ($\chi^2=0.41$; $df=2$; 資料沒有拒絕模型)，「監控行為」與「嚴厲教養」對「暴力行為」的直接關係 γ_{21} 及 γ_{22} 皆不顯著，但以「親子關係」作為中介變項的三條傳遞路徑 γ_{11} 、 γ_{12} 和 β_{21} 卻為顯著。為求明確釐清各變項之間的關係，本文以模型一作為「基準模型」，首先以刪除 γ_{21} 的模型二作比較，模型一與模型二的比較結果為 $\Delta\chi^2=3.16$; $df=1$; $p>.05$ ，由於模型一較模型二多估計一個參數，但多估計的參數卻沒有顯著提高模型的適合度，故取模型二為佳，接著比較模型二和模型三的結果顯示， $\Delta\chi^2=4.45$; $df=1$; $p<.05$ 達顯著，因而比較結果呈現出以模型二為佳。如果單就模型二的結果來看，模型的適合度($\chi^2=3.57$; $df=3$)，顯示出資料並沒有否定本研究的理論模型，就「暴力行為」的兩個指標之因素負荷值來看，分別為 0.33 和 0.71，因此「暴力行為」此一潛在變項，主要的指標來源是「暴力傾向」，這樣的結果非常合理，也與國外的文獻一致(Simons et al. 1994)。進一步看各變項的關係，可以清晰地看出一個以「親子關係」作為中介傳導的路徑關係，其中「監控行為」、「嚴厲教養」對「親子關係」的gamma係數分別為 0.28 與-0.33，「親子關係」對「暴力行為」則為-0.26，而「監控行為」與「嚴厲教養」對「暴力行為」的直接路徑皆不顯著。如果搭配表五，可以清楚看出原先顯著的直接效果，由於「親子關係」的介入，致使原關係消失。總的來說：母親對兒子的教養行為與暴力行為間的關係，並非過去研究所說的簡單，實際上更重要的是「親子關

7 過去部分研究曾指出行動者的「負向行為」，對青少年印象的形成更具影響力(Fiske and Taylor 1991)，本研究曾試圖以「負面評價」作為控制變項，以確證本研究的關係機制不受負面印象所干擾，控制後的結果與表十相差不遠，為求將焦點放在教養及親子關係的議題上，讓本研究整體結構更為一致，因此不將此部分列於本研究內容中。



圖三 父母教養與暴力行爲之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以親子關係作為中介變項

表八 以親子關係作為中介變項之結構方程模型各係數摘要表

路徑	母親－兒子			父親－兒子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γ_{11}	.28*	.28*	.28*	.32*	.32*	.32*
γ_{12}	-.33*	-.33*	-.33*	-.29*	-.29*	-.29*
γ_{21}	-.10			-.19*	-.20*	
γ_{22}	.12	.13		.13†		
β_{21}	-.22*	-.26*	-.31*	-.20*	-.24*	-.33*
ϕ_{12}	-.15*	-.15*	-.15*	-.18*	-.18*	-.18*
暴力行爲						
λ_{22}	.32	.33	.32	.35	.35	.37
λ_{32}	.74	.71	.72	.66	.66	.63
樣本數(N)	558	558	558	556	556	556
χ^2	.41	3.57	8.02	.33	4.58	13.94
df	2	3	4	2	3	4
模型比較						
模型二 $\Delta\chi^2_{(1)}$		3.16	4.45*		4.25*	9.36*

註：所有因素負荷值皆顯著，*p<.05, †p<.05 單尾

係」所形成的中介機制，才是母親影響兒子行為的核心。那麼父子間是否如同母子一樣，有中介的機制呢？

接著，以上述的方法分析父親對兒子的模型，由表八得知，模型一的 $\chi^2=0.33$ (df=2)，此模型中「監控行為」與「嚴厲教養」對「暴力行為」的直接關係 γ_{21} 為顯著，而 γ_{22} 也達單尾顯著，由於 γ_{22} 只有單尾顯著，故進一步以刪除 γ_{22} 的模型二作比較，比較的結果達顯著($\Delta\chi^2=4.25$; df=1; $p<.05$)，取模型一為最佳模型。模型一的結果顯示($\chi^2=0.33$; df=2)資料與模型相契合，接著觀察各影響的路徑，可以發現「監控行為」、「嚴厲教養」及「親子關係」對「暴力行為」除了「嚴厲教養」是單尾顯著外，其餘皆為雙尾顯著，各係數分別為-0.19, 0.13及-0.20；而「監控行為」和「嚴厲教養」對「親子關係」同樣也達顯著(0.32和-0.29)，此結果代表了父親對兒子的影響，除了有Patterson et al. (1989); Jang Sung Joon and Carolyn Smith (1997)等人所說的直接關係外，還有以「親子關係」作為中介的間接關係。此與母親對兒子模型是以所知覺的「親子關係」作為中介傳導有所不同，為何父母間會有此差異呢？是否由於父母教養內容上的差異呢？接下來，第四節將把焦點放在父母教養的內容上。

(四) 父母教養行為內涵的差異性

在表三中，已就父母監控與嚴厲兩個教養面向進行比較，結果發現母親較父親有更高的監控行為及較低的嚴厲教養，並在第二及第三節驗證及陳述出，親子關係中介效果的重要性，而且更帶出母親與父親在影響過程的差異。接下來的問題是，父親與母親影響機制的差異，是否來自於雙方管教內涵的差異呢？即在量化的結果下父母的得分可能同為10分，但內容上卻大不相同。表九為監控行為及嚴厲教養兩變項間各指標的基本統計分數，可以清楚地看到，父母間有差異的項目為「知道小孩行踪」、「知道小孩跟誰在一起」、「討論小孩的生活」、「知道小孩回家與上床睡覺的時間」和「太忙沒有時間陪小孩」五項，從差異分數更可看出父母差異最大的是「知道小孩行

表九 父母監控行為與嚴厲教養各指標的基本統計摘要表

	平均數			標準差		樣本數	零相關	t-test
	$\bar{x}_{母}$	$\bar{x}_{父}$	$\bar{x}_{母} - \bar{x}_{父}$	母親	父親			
監控行為								
知道每天的行踪(X1)	3.78	3.41	.37	1.30	1.37	563	.79**	10.22**
知道他跟誰在一起(X2)	3.77	3.48	.29	1.29	1.40	563	.82**	8.45**
討論他的生活種種事情(X3)	3.34	3.14	.20	1.24	1.30	561	.82**	6.05**
規定他回家與上床睡覺時間(X4)	2.75	2.71	.04	1.43	1.44	561	.86**	1.21
知道他回家了或已經上床睡覺(X5)	4.24	4.10	.14	1.14	1.24	563	.87**	5.28**
太忙而沒有時間陪他(X6)	4.10	3.77	.33	1.07	1.19	561	.69**	8.76**
嚴厲教養								
大聲咆哮(X7)	1.83	1.80	.03	1.16	1.15	563	.70**	.85
毆打你(X8)	1.36	1.39	-.03	.84	.85	562	.68**	-.87
鞭打你(X9)	1.36	1.38	-.02	.81	.84	563	.64**	-.60
把你趕出去或鎖在門外(X10)	1.18	1.17	.01	.56	.53	563	.60**	.69

* $p < .05$, ** $p < .01$

踪」，其次為「太忙沒有時間陪小孩」，接下來為「知道小孩跟誰在一起」，這些項目上的差異，正能反映出母親為主要照顧者的特點(Kumpfer and DeMarsh 1986)，至於嚴厲教養各項目並沒有明顯的差異，這與表三的結果一致。

另外，就各指標作父母間的比較，表十明顯可以看出父母間的因素負荷值以多群組模型比較後，全部指標皆取「基準模型」為最佳，代表父母兩者間教養行為各指標間並沒有差異，表示父或母所建構的監控與嚴厲兩個變項，其結構基本上相同。如果我們接下來看監控行為及嚴厲教養各指標間的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之因素負荷值，可以發現監控行為其順序分別為：「知道小孩跟誰在一起」、「知道小孩行踪」、「討論小孩的生活」、「知道小孩回家與上床睡覺的時間」、「太忙沒有時間陪小孩」和「規定小孩回家與上床睡覺時間」，嚴厲教養則為：「毆打你」、「鞭打你」、「大聲咆哮」和「把你趕出去或鎖在門外」。總的來說，從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發現父母間在監控行為上只有五個指標是有差異的，不過進一步作模型比較後，「監控行為」及「嚴厲教養」兩者的內在構成卻沒有多大差異，如果是這樣

的話，表示出父母對子女的影響機制並沒有受父母教養行為內涵不同的干擾⁸。因此父母對子女影響機制的差異，則可先放在較廣的父母管教角色上的差異來討論，本文最後的討論將會作詳細的說明。

表十 比較父母兩組各指標負荷值的差異

		$\lambda_{母}$	$\lambda_{父}$	χ^2	df	$\Delta\chi^2_{(1)}$	p-value
λ_{11}	基準模型	.77	.77	92.49	24	1.29	p>.01
	對立模型	.74	.80	91.20	23		
λ_{21}	基準模型	.83	.83	92.49	24	3.75	p>.01
	對立模型	.78	.88	88.74	23		
λ_{31}	基準模型	.63	.63	92.49	24	.14	p>.01
	對立模型	.64	.62	92.35	23		
λ_{41}	基準模型	.27	.27	92.49	24	.03	p>.01
	對立模型	.27	.27	92.46	23		
λ_{51}	基準模型	.55	.55	92.49	24	.02	p>.01
	對立模型	.55	.55	92.47	23		
λ_{61}	基準模型	.31	.31	92.49	24	.12	p>.01
	對立模型	.29	.32	92.37	23		
λ_{71}	基準模型	.63	.63	76.66	8	.96	p>.01
	對立模型	.66	.61	75.70	7		
λ_{81}	基準模型	.70	.70	76.66	8	.60	p>.01
	對立模型	.73	.68	76.06	7		
λ_{91}	基準模型	.69	.69	76.66	8	.10	p>.01
	對立模型	.68	.69	76.50	7		
λ_{101}	基準模型	.55	.55	76.66	8	3.81	p>.01
	對立模型	.49	.61	72.85	7		

8 因為兩者間的構成基本上是類似，只有總加分數上的差異，即只有程度上的差異沒有內容上的差異，不過有一點需要聲明，以上的分析只就本研究所用的既定量表而言，事實上，父母在教養行為上，很有可能存在著脈絡性與過程性的特殊差異。由於本研究的旨趣，著重在父母對子女的影響機制與可能的路徑，建議後續的研究可從質化的研究方法，剖析父母教養行為的內涵與脈絡活動對子女的影響。

六、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試圖檢視父親與母親的教養行爲（本文指的是「監控行爲」及「嚴厲教養」兩個面向）對兒子形成暴力行爲的過程。藉著台北市青少年長期追蹤樣本的資料，首先，我們發現到兒子評價的母子關係均較父子關係爲佳，至於在教養上，傳統觀念下的嚴父慈母現象 (Shek 2000)，在本研究中並未呈現，在嚴厲教養上，父親與母親無論在項目及總分上，均不存在有任何差異。但就父親對兒子的「監控行爲」而言，卻遠比母親爲低，反映出父親對於兒子日常的狀況以及平日的照顧，都較母親爲低。此與大部分的父親必須出外工作，由母親負責照顧有密切關係。如果從父母對兒子的教養行爲著眼，不難發現父親的形象，在兒子心目中，樹立著疏離的訓導者角色，這與母親在兒子心中的形象並不盡相同，那麼在父子關係與母子關係的不同連結間，是否導致對兒子不同的影響過程呢？

本文第一部份的分析，延續過去家庭教養行爲對青少年偏差行爲及暴力行爲的觀點（即本文所統稱的「直接效果」模式），明確地驗證了先前研究所指出，青少年的暴力行爲或偏差行爲與父母親缺乏有效的監督 (Jang and Smith 1997)，或採取嚴厲的手段有關 (Crandall et al. 1960; Patterson et al. 1989; Dishion 1990)，反映出台灣社會中，家庭內父母教養方式與青少年暴力行爲間的關係，某種程度上（指的是在沒有考慮互動或傳遞層面的直接效果）與國外的發現相一致，即父母的行爲某種程度上影響著青少年的發展。過去有研究者 (Steinmetz 1987) 將這種代間的傳承，賦予「暴力循環」(cycle of violence) 的概念，並以「家庭社會化」的觀點，將這種父母對子女的影響過程看成是一種單純的「學習」過程，即認爲父母的行爲模式與行事特質，會成爲小孩的重要參考對象，並逐漸轉移內化爲自己的行爲模式，所以孩子如果在嚴厲教養的環境中生活，很容易在社會化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學習到殘忍冷酷及暴力傾向，藉著這種轉化而形成模仿的行爲模式。無

可否認，過往的研究已經點出了一條可行的路徑，在父母的教養行為中找到了可能的影響原因，不過這個思考方式，卻將社會化及學習的過程，看成是單純環境（父母行為）對個人（青少年）的一種影響過程，並將個體看成是被動的接收者；本研究的一系列分析，便是試圖從直接性的影響機制，在「主體及關係」的角度下，藉著兒子對父母「親子關係」的知覺，重新思索及釐清這個問題，並重新思考「調節」或「中介」機制的影響。

首先，就「調節效果」而言，本文在分析方法上，並沒有採用過去交互作用項的方式，而改以條件取向的形式，即以不同程度的親子關係，來重新考驗「直接效果」的模型；因此本研究藉由兒子對父親或母親的關係好壞，區分出知覺關係佳與關係差兩組，用以回答兒子會不會在不同關係條件下，而有不同的影響結果。分析的結果發現，不管兒子知覺的父母關係是好是壞，父母的監控與嚴厲行為均對兒子產生影響，即兒子知覺的親子關係不具有調節的作用。意謂著知覺到與父母關係好的這一群，和知覺與父母關係差的這一群青少年，在父母教養行為上，均對兒子暴力行為本身有一定的預測力，即兒子知覺到的「親子關係」並不是一種條件式的影響關係，它不會因著不同群體間而有所不同。這個結果與過去中西方文獻的說法有所出入，原因可能有二：(1)當然是我們使用的分析方法不同；(2)很有可能是過去的文獻只著重在親子關係與教養行為的交互作用上，沒有注意到子女「知覺」的層面，即模型已隱含著子女為被動者的角色，因此他們的分析及結果只注意到「互動」的層面，而缺乏去了解子女在教養過程所扮演的角色與機制。

實際上，從本文進一步的分析中，我們確實看到了當沒有將親子關係作為「中介」角色時，無論是父或母的監控行為及嚴厲教養均對青少年暴力行為產生影響。但是，如果將教養行為對暴力行為的影響以兒子所知覺到的親子關係作為兩者之中介時，父親和母親卻出現不同的結果，就父親而言，監控與嚴厲行為仍然對青少年暴力行為有直接的影響，另外還存在著一個經由親子關係傳遞的間接關係，但對於

母親來說，監控行為與嚴厲教養卻是透過親子關係才能影響到青少年身上。是故，分析結果反映的是：(1)父母對兒子的影響過程是有差異的，(2)兒子知覺到的「親子關係」在父母對兒子的影響上，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甚至成為母親教養對兒子行為發展的中介傳導角色。

鑑於過去不少研究（吳齊殷、陳易甫 2001; Garnier and Stein 2002），在家庭環境的影響上，只以母親為主要的分析對象，本研究指出，實際上父母對兒子的影響過程是有所不同的，不能單純因為母親是兒女的主要照顧者，就忽略了父親的重要性。至於，父母對兒子的影響為何會有差異，其中一個原因可能與父—子和母—子間不同的連結有關，Gilligan(1982)曾指出女生著重於親密的連結而男生關注的卻是分離，李美枝(1998)也發現母親長時間扮演照顧者的角色，使得父子的心理親密度低於母子，代表母子間有較高的情感交流與溝通，吳齊殷、陳易甫(2001)亦指出母親不當的教養可能會以失當的親子關係呈現。Dan Kindlon and Michael Thompson (1999)在《該隱的封印》(*Raising Cain*)一書中以「渴望與距離的延伸」來形容父與子的連結，而以「連結與變遷的故事」來形容母與子，實在相當貼切，因為如果從性別間「親密」與「分離」去思考，不難發現母子間由於長時間的接觸，以及兩者間的親密與情感連帶，青少年對於母親的行為也採取以關係為主的知覺脈絡，並以兩人的關係去評估母親的教養行為是出於善意或惡意，再進而影響青少年的暴力行為，因此不難理解為何親子關係在母子間扮演著相當重要的中介角色；但相對地，父親由於與子女缺乏溝通時間，加上男生本身分離的情感連帶，形成青少年無法單純以關係去衡量父親的教養行為，進而造成教養行為會經由父親直接以及親子關係的間接影響到青少年暴力行為。總的來說：這個發現提醒我們，應該更重視父母與兒子間的不同關係形式，因為親子間關係的強度會影響父母行為對兒子的回饋，尤其是母親與兒子間的關係品質更是不可忽視，本文雖然無法直接去驗證 F. Rothbaum 等人(1995)所說的，母子關係可有效預測日後的行為而父子關係卻不能，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母子間的關係在教養行為與青少年暴力行為發

展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中介地位，當青少年知覺到的親子關係是正面時，能有效減緩他們暴力行為的形成。事實上，對兒子來說，他會以自己認為的父母形象與關係來衡量父母的行為意圖，之後才會影響到青少年本身，因此如果平日與兒子保持良好的溝通以及密切的親子關係，即便父母以嚴厲的方式教導，或者有時候沒有妥善監控，青少年也可能以正面的態度去解讀父母的行為，而不至於輕易掉入偏差或暴力的迴圈。故父母在管教的過程中，有必要理解子女行為背後是「明知故犯」，抑或只是無心之失，如果是「故意抗命」便應作適當的因應，對於不必要無理取鬧的責罵，對管教子女並沒有助益(Dobson 1996)。因此父母管教的目的是要讓小孩理解何謂對錯，如果父母不假思索地以懲罰方式對待小孩，也不理會犯錯的原因與意圖，這樣的管教只會導致更嚴重的行為問題(Patterson 1982)，而且，再加上父母子女間關係的不協調，問題就會更加嚴重。

至於，親子關係的中介效果所隱含的意義如下：首先，本研究的結果與大部分華人社會研究（例如：Shek and Ma 1997; Ma et al. 2000; 朱瑞玲 1989）所認為，青少年知覺父母的行為具有關鍵作用的觀點是一致的，這樣的結果代表了父母行為對華人子女的影響是經由子女對行為的評估而成。不過儘管過去的研究，已對子女「知覺」父母行為的影響力作出了驗證，卻無法對「知覺」的影響歷程，有更明確的說明，本研究分析的第三部分所驗證的「中介」影響模型，重新賦予了「環境」、「個人認知」和「行為」的理論脈絡，即父母的行為並非平白地對子女產生影響，也不是只有子女知覺才是主因，它是一個外在行為經個人知覺評估再進而對子女行為產生影響的過程，因此本研究活化了過去家庭與青少年行為研究的觀點，並且呼應了前言中，我們所一再強調的，子女並非一張白紙，他不是被動地受外在環境影響，而是因著外在環境的狀況，透過個體（青少年）在真實環境中與家庭成員關係的建立，藉著個體對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的知覺與感知，而進一步影響個體的行為。因此，過往社會化理論所說的：「個體透過社會化機制逐漸被培養或學習（模仿）到一定的行為與價

值」，應進一步補充為「透過個體對社會化機制的主觀認知和思維，才進一步地影響行為面」，正如 Bandura (1986)所說：「只從環境中找尋行為的最終原因將是無效的」。

儘管本研究已在方法及理論觀點上力求創新，但仍然碰到以下的研究限制：首先，本文並非一份跨文化研究的論著，因此對於論文中「中介效果」及父母間的差異，大約只能推及於台灣或類似的華人社會。然而，如果我們進一步與 Simons 等人(2000)的研究對話，大致上可以推敲出，華人社會的子女並不是父母打罵或過份監管，就會認為父母是不當的，因為在我們的文化中，一直存在著強烈的「尊卑」與「服從」，對於父母一定程度上的管教，子女普遍上是可以接受的，除非子女主觀知覺認為與父母是疏離，才會激發負面的聯想。至於西方社會的文化觀，則以「平等」與「自主」為主，父母的不當管教對於子女來說，不論是輕微或嚴重，也不管雙方關係的緊密與否，都被認為是不對的。這些只是本研究與 Simons 等人文章對話的暫時論述，日後的研究可循跨文化研究的策略，重新作出驗證。另外，由於本文是以線性的結構方程模型作分析，對於非線性的關係則沒有探討，其次父母教養行為的不同程度與青少年行為發展的關係，以及父母處罰行為出現的時間點與青少年行為關連等議題，則可為後續研究探討的問題。

最後，本文延續上述的發現，進一步補充「社會化」此一概念，並提出「動態社會化」(dynamic socialization)歷程的觀點，作為未來研究的另一個思考起點，此觀點認為個體不單為社會力的承載者，亦是社會的施力者，而且在「施」與「載」之間個體更擔負著兩者的角力。在每一個時間點下所存在的「環境」、「個體」與「行為」三者，相輔相成地在時間的脈絡下不停地在互動著，前一個行為會影響下一個「環境」因素，再藉著個體的知覺而形成不同的行為及價值反映，整個過程不斷地進行著互動，譬如母親在第一個時間點時是以不當嚴厲教養子女，子女也認為母親是不當的，因而出現偏差或暴力行為的傾向，在第二個時間點中，母親可能由於第一個時間點時，子女

出現了不良行為，而調整自己的教養方式，子女對母親的看法變得沒有那麼負面，不良行為的傾向進而下降。本文建議日後的研究重心應放在動態層面及各時間點中三者的關係上，以進一步釐清箇中關係。

誌謝：作者首先感謝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研究計畫(DOH86, 87, 88-HR-621)補助。本研究為第一作者碩士論文的延伸議題，在此特別感謝薛承泰教授對原論文的教導、指正與討論。另外，作者們也非常感謝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家庭與生命史研究群所有成員的協助，以及伊慶春教授對青少年計畫長期的支持與後續研究的協助，尤其感謝章英華教授對本研究的批評與討論，謝雨生和林桂綉教授對於分析方法的寶貴意見，以及特別要感謝周玉慧教授對本研究所提供的寶貴建議及相關文獻的分享，並感謝她撥空批改。最後，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和台灣社會學編輯委員的精闢見解及指教，以及謝麗玲小姐文章編輯上的協助，謹此誌謝。本文之全部論點、見解及錯漏，概由作者自負。

參考文獻

- 朱瑞玲(1989)親子關係：子女的知覺與解釋及其影響，頁 181-246，伊慶春、朱瑞玲主編，台灣社會現象的分析。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
- 李美枝(1998)中國人親子關係的內涵與功能：以大學生為例。本土心理學研究 9: 3-52。
- 林惠雅(1999)母親信念、教養目標與教養行為。應用心理研究 2: 143-180。
- 周玉慧、吳齊殷(2001)教養方式、親子互動與青少年行為：親子知覺的相對重要性。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13(4): 439-476。
- 周玉慧(2001)親子間正負面社會交換：青少年長期資料分析。青少年生命歷程與生活調適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2001年6月28-29日。
- 吳明燁(1998)青少年初期父親與母親管教行為之比較。東吳社會學報 7: 39-79。
- 吳齊殷、高美英(1997)嚴酷教養方式之代間傳承。收於張荳雲、呂玉瑕、王甫昌主編，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頁 215-247。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吳齊殷(2000)家庭結構、教養實施與青少年的行為問題。台灣社會學研究 4: 51-95。
- 吳齊殷、陳易甫(2001)家內暴力的成因與後果：以母親為例。應用心理研究 11: 169-191。
- 吳齊殷、李文傑(2003)青少年憂鬱症狀與偏差行為併發之關係機制。台灣社會學 6: 119-175。
- 侯崇文(2001)家庭結構、家庭關係與青少年偏差行為探討。應用心理研究 11: 25-43。
- 高淑芳、陸洛(2001)父母管教態度與國中生升學考試壓力感受之關係。應用心理研究 10: 221-250。
- 法務部(2002)中華民國九十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台北：法務部。
- 章英華(2001)家庭與青少年行為之間：尋找中介機制。應用心理研究 12: 1-4。
- 陳毓文(1999)論少年暴力行為與暴力環境之相關性。台大社會工作學刊 1: 1-33。
- 張開城(1993)社會性·社會化·社會互動與青少年問題。湖南師大社會科學學報 97: 132-136。
- 黃惠玲、林銘塗(1993)心理衡鑑在青少年犯罪的運用及其探討。台北：青輔會。
- 葉光輝(1995)社會化歷程中的父母教化方式與子女的行為發展。中華心理學刊 37 (2): 149-169。
- 羅國英(2000)母親教養期望與親職壓力及青少年親子關係知覺的關聯。東吳社會

- 工作學報 6: 35-72。
- 熊秉真(2000)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台北：麥田。
- Aiken, L. S. and S. G. West (1993)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 Newbury Park: Sage.
- Acock, A. C. and G. M. Clair (1986)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New York: Garland.
- Acock, A. C., R. D. Day, and C. R. Bolkan (2002) Youth Problem Behavior and Their Perception of Parental Behavior: Do Perceptions of Fathers' Cou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llocation of Social and Family Resources in Changing Societies. ISSP, Academia Sinica, Taipei.
- Baldwin A. L., C. P. Baldwin, T. Kasser, M. Zax, A. Sameroff, and R. Seifer (1989) Contextual risk and resiliency during late adolescence. *Development Psychopath* 5: 741-761.
- Bandura, A. (1973) *Aggression: A Social Learning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Bauman, K. E., and L. A. Fisher (1986) On the Measurement of Friend Behavior in Research on Friend Influence and Selection: Finding from Longitudinal Studies of Adolescent Smoking and Drinking.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5(4): 323-340.
- Blaske, D. M., C. M. Borduin, S. W. Henggeler, and B. J. Mann (1989) Individual, Family, and Peer Characteristics of Adolescent Sex Offenders and Assaultive Offender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5: 846-855.
- Brannigan, A., William Gemmell, David J. Pevalin, and Terrance J. Wade (2002) Self-Control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ldhood Misconduct and Aggression: The Role of Family Structure, Hyperactivity, and Hostile Parenting. *Canad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4(2): 119-142.
- Byrne, B. M. (1998)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LISREL, PRELIS, and SIMPLIS: Basic Concepts, Applications, and Programming*. NJ: Lawrence Erlbaum.
- Cairns, R. B. and B. D. Cairns (1995) *Lifelines and Risks: Pathways of Youth in Our Tim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 Carter Hay (2001) Parenting, Self-Control, and Delinquency: A Test of Self-Control Theory. *Criminology* 39(3): 707-736.
- Cernkovich, S. and P. Giordano (1987)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25: 295-318.

- Cohen S. and P. Cohen (1983) *Applied Multiple Regression/ 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 Erlbaum.
- Coleman, M. C. (1992) *Behavior Disorder: Theory and Practice*. Needham Heights: Allyn and Bacon.
- Coltrane, S. (1995) The Future of Fatherhood: Social,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Influences on Men's Family Involvements. Pp. 255-274 in *Fatherhood: Contemporary Theory, Research, and Social Policy. Research on Men and Masculinities Series 7*, edited by W. Marsiglio. CA: Sage.
- Crandall, E. J., A. Preston, and A. Robson (1960) Maternal Rea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ce and Achievement Behavior in Young Children and Youth. *Child Development* 31: 243-251.
- Craven, S. V. (1997) *Examination of the Physiological, Emotional, and Social Cognitive Processes in Boys' Response to Peer Provocation at Three Levels of Aggression*. Unpublished Ph.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uke University.
- Daly, K. J. (1995) Reshaping Fatherhood: Finding the Models. Pp.21-40 In *Fatherhood: Contemporary Theory, Research, and Social Policy*, edited by W. Marsiglio. CA: Sage.
- David Jary and Julia Jary (1998) *Harper Collins Dictionary*. 台北：城邦（中譯本）
- Derogatis, L. R. (1983) *SCL-90-R: Administration, scoring, and procedures manual-II*. Towson, MD: Clinical Psychometric Research.
- Dishion, T. J. (1990) The Family Ecology of Boys' Peer Relations in Middle Childhood. *Child Development* 61: 874-892.
- Dobson, J. C. (1996) *The Strong-Willed Child*. 台北：遠流（中譯本）
- Dodge, K. A., J. E. Bates, and G. S. Pettit (1992) Some Consequences of Early Harsh Discipline: Child Aggressive and a Maladaptive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yle. *Child Development* 63: 1321-1335.
- Elder, Glen H., Monica K. Johnson, and Robert Crosnoe (2002)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Course Theory. Book chapter in Jeylan T. Mortimer and Michael J. Shanahan (Eds.)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forthcoming.
- Elliott, Delbert S., David Huizinga, and Scott Menard (1989) *Multiple Problem Youth: Delinquency, Substance Use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Eron, L., L. R. Huesmann, P. Brice, and R. Mermelstein (1983) Age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gression, Sex Typing, and Related Television Habits.

-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 71-77.
- Fish, L. (2000)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Parent and Children.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26(4): 501-510.
- Fiske, S. T. and S. E. Taylor (1991) *Social Cognition*. New York: McGraw Hill.
- Garnier, H. E. and J. A. Stein (2002) An 18-Year Model of Family and Peer Effects on Adolescent Drug Use and Delinquenc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1(1): 45-56.
- Gibbons, D. C. (1976) *Delinquent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ttfredson, Michael R. and Travis Hirschi (1990)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gan, John and Alberto Palloni (1988) Crimes as Social Events in the Life Course: Reconceiving a Criminological Controversy. *Criminology* 26: 87-100.
- Hausman, A. J., H. Spivak, and D. Prothrow-Stith (1994) Adolescents'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about and Experience with Violent.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15: 400-406.
- Heimer, Karen and Stacy De Coster (1999) The Gendering of Violent Delinquenc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7(2): 277-317.
- Hirschi, T. (1969) *Causes of Delinquency*. Berkeley: UC Press.
- Hochschild, A. (1989) *The Second Shift*. New York: Avon Books.
- Hoffmann, J. P. and Felicia Gray Cerbone (1999)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Delinquency Escalation in Early Adolescence. *Criminology* 37(2): 343-373.
- Iannotti, Ronald J. and Patricia J. Bush (1992) Perceived VS Actual Friends' Use of Alcohol, Cigarette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1(3): 1129-1135.
- Ireland, T. O., Carolyn A. Smith, and Terence P. Thornberry (2002) Developmental Issues in the Impact of Child Maltreatment on Later Delinquency and Drug Us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0(2): 359-399.
- Jackson, C. and V. A. Foshee (1998) Violence-related Behaviors of Adolescents: Relations with Responsive and Demanding Parenting.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13(3): 343-359.
- Jang, S. J. (1999) Age-Varying Effects of Family, Alcohol, and Peers on Delinquency: A Multilevel Modeling Test of Interactional Theory. *Criminology* 37(3): 643-685.
- Jang, S. J. and C. A. Smith (1997) A Test of Reciprocal Causal Relationships Among Parental Supervision, Affective Ties, and Delinquency. *Th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4(3): 307-336.

- Kauffman, J. M. (1993)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otional and Behavior Disorders of Children and Youth* (5th ed.). Columbus, Ohio: Merrill.
- Kazdin, A. E. (1987) Treatment of Anti-Social Behavior in Children: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2: 187-203.
- Kelloway, E. K. (1995)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6: 215-224.
- Kindlon, D. and M. Thompson (1999) *Raising Cain: Protect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Boys*. 台北：商周出版（中譯本）
- Kumpfer, K. L. and J. DeMarsh (1986) Family Environmental and Genetic Influences on Children's Future Chemical Dependency. *Journal Child Contemporary Social* 18: 49-91.
- Kupersmidt, J. B., P. C. Griesler, M. E. Derosier, and C. J. Patterson (1995) Childhood Aggressive and Peer Relations in tht Context of Family and Neighborhood. *Child Development* 66: 360-375.
- Lackey, C. and K. Williams (1995) Social Bonding and the Cessation of Partner Violence Across Generation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7: 295-305.
- Larzelere, Robert E. and Gerald R. Patterson (1990) Parental Management: Mediator of the Effec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Early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28: 301-323.
- Laub, J. H. and R. J. Sampson (1988) Unraveling Families and Delinquency: A Re-analysis of the Gluecks' Data. *Criminology* 26: 355-380.
- Liddle, H. A. and A. Hogue (2000) A Family-Based Developmental-Ecological Preventive Intervention for High-Risk Adolescents.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26: 265-279.
- Lin, Nan (1976) *Foundations of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McGraw-Hill.
- Linda L. Dahlberg (1998) Youth Viol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Major Trends, Risk Factors, and Prevention Approaches.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4(4): 259-272.
- Loeber, R. and T. Dishion (1983) Early Predictors of Male Delinquency: A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4: 68-99.
- Ma, H. K., D. T. L. Shek, P. C. Cheung, and Christina Oi Bun Lam (2000) Parental, Peer, and Teacher Influences on the Social Behavior of Hong Kong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61(1): 65-78.
- Maccoby, E. E. (1984) Soci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al Change. *Child Development* 55: 317-328.

- Magnusson, D., H. Stattin, and A. Duner (1983) Aggression and Criminality in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Pp. 277-302 in *Prospective Studies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edited by K. Dusan and Mednick. Netherlands: Kluwer-Nijhoff.
- Nugent, J. K. (1991)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Influences on the Father's Role in Infant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3: 475-485.
- Overbeek, G. Wilma Vollebergh, Wim Meeus, Rutger Engels, and Erik Luijpers (2001) Course, Co-Occurrence, and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of Emotional Disturbance and Delinquency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A Six-Year Three-Wave Stud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0(4): 401-426.
- Parke, R. D. and R. Buriel (1998) Socialization in the Family: Ethnic and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463-552 in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3: Social,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5th ed.), edited by W. Damon and N. Eisenberg. New York: Wiley.
- Patterson, G. R. (1982) *A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 to Family Intervention, Vol. 3: Coercive Family Process*. Eugene, OR: Castalia.
- (1986) Performance Models for Antisocial Boy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 432-444.
- Patterson, G. R., B. D. De baryshe, and E. Ramsey (1989)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Antisocial Behavior.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 329-335.
- Rothbaum F, K. S. Rosen, M. Pott, and M. Beatty (1995) Early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Later Problem Behavior: A Longitudinal Study. *Merrill Palmer Quarterly* 41: 133-151.
- Sampson, Robert J. and John H. Laub (1995) Understanding Variability in Lives Through Time: Contributions of Life-Course Criminology. *Studies on Crime and Crime Prevention* 4: 143-158.
- Sears, R. R., E. Maccoby, and H. Kevin (1957) *Patterns of Child Rearing*.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Shek, D. T. L. (1995) Chinese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Parenting Styles of Fathers and Mothers.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56(2): 175-190.
- (2000) Differences between Fathers and Mothers in the Treatment of, and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Teenage Children: Perceptions of Chinese Adolescents. *Adolescence* 35: 135-146.
- Shek, D. T. L. and H. K. Ma (1997) Perceptions of Parental Treatment Styles and Adolescent Antisocial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a Chinese Context. *Psychologia* 40:

233-240.

- Sigel, I. E. (1985)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Beliefs. Pp. 345-371 in *Parental Belief Systems: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for Children*, edited by I. E. Sigel. New Jersey: Lau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Simons, Ronald L., Les B. Whitbeck, Rand D. Conger, and Chyi-in Wu (1991)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arsh Parent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7: 159-171.
- Simons, Ronald, Christine Johnson, and R. D. Conger (1994) Harsh Corporal Punishment Versus Quality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as an Explanation of Adolescent Maladjust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6: 591-607.
- Simons, R. L., Chyi-In Wu, Kuei-Hsiu Lin, Leslie Gordon and Rand D. Conger (2000) A Cross-Cultural Examination of the Link between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Adolescent Antisocial Behavior. *Criminology* 38(1): 47-80.
- Simons, R. L., Eric Stewart, L. C. Gordon, R. D. Conger, and G. H. J. Elder (2002) A Test of Life-Course Explanations for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Antisocial Behavior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Criminology* 40(2): 401-434.
- Smith, C. and T. P. Thornberry (199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Adolescent Involvement in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33(4): 451-481.
- Steinmetz, S. (1987) Family Violence. Pp. 725-765 In *Handbook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edited by M. B. Sussman and S. K. Steinmetz. New York: Plenum Press.
- Straus, M. A. and K. G. Kaufman (1994) Corporal Punishment of Adolescents by Parents: A Risk Factor in the Epidemiology of Depression, Suicide, Alcohol Abuse, Child Abuse, and Wife Beating. *Adolescence* 29(115): 543-561.
- Tami M. Videon (2002) The Effects of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and Parental Separation on Adolescent Well-Bei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 489-503.
- Thornberry, Terence P. (1997) *Developmental Theories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Tolan, P. H. (1988) Delinquent Behaviors and Male Adolescent Development: A Preliminary Stud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7: 413-427.
- Vogt, W. Paul (1999) *Dictionary of Statistics & Methodology: A Nontechnical Guid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2nd ed.). CA: Sage.
- Zahn-Waxler, C., M. Radke-Yarrow, and R. A. King (1979) Child Rearing and Children's Prosocial Initiations Toward Victims of Distress. *Child Development* 50: 319-330.